

# 元答己太后與漢文化\*

許正弘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 引言

蒙元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複合社會。各民族間在政治與文化上有極為廣泛的交流與影響，成為元史研究的主要課題，受到歷來論者關注。作為征服民族的蒙古人與被征服民族的漢人（包括南人），兩者間的文化關係，尤為學者討論的重心，成果迭見。其中，蒙古人與漢文化的關係，過去學者受到趙翼（1727–1814）的影響，認為元代蒙古人仍多倚恃本族文字，未能習學漢文，可謂漢文化的門外漢。然而近年來中外學者的研究已足證明：元朝帝王既能通漢文，帝王之外的蒙古人亦頗有漢學素養深厚者。<sup>1</sup>

蒙元帝王的漢學造詣，前輩學者討論已多，大致認為：包括世祖在內的早期諸帝，的確未識漢文，對漢人文化也有所隔膜。中期以後，由草原入繼大統的成宗、武宗與泰定帝三帝，對漢文化的接觸尚少，而仁宗、英宗、文宗與順帝對中原文學與藝術卻已具相當的素養。<sup>2</sup>元中期諸帝之外，漢文化浸潤既深，又熱心於藝文的提倡，皇室女性也有類似的人物。最為人矚目的，莫過於魯國大長公主祥哥刺吉（約

---

\* 此文之撰作，承蕭啟慶師指導與鼓勵至多。文稿初成，洪金富師惠閱一過，匡正謬誤。論文在「『東亞歷史變遷』研究計畫——身體、性別與多元文化：博士生論文發表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2010年5月15日）宣讀時，又蒙許守泯教授評論，多所指教。在此謹致謝忱。另外，本文二位匿名審查人詳盡與精闢的意見，部份已改正並納入文中，謹此敬申謝悃。

<sup>1</sup> 關於元朝帝王漢學造詣的研究，詳見蕭啟慶：〈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載蕭啟慶：《蒙元史新研》（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頁251–52。帝王以外蒙古人漢學的全面性研究，參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載《蒙元史新研》，頁97–216。

<sup>2</sup> 蕭啟慶：〈論元代蒙古人之漢化〉，頁251–52。

1283–1331)。此人可說是元代皇室最為著名與重要的書畫收藏家及贊助者。<sup>3</sup>至於其他皇室女性的文化傾向，討論尚少。<sup>4</sup>

縱觀元中期以後的帝系承傳，除成宗與泰定帝外，武宗以降，無不出自順宗答剌麻八剌(1264–1292)一脈。有元一代，貴擁太后尊號者，僅僅裕宗妃伯藍也怯赤(又名闊闊真，?–1300)、順宗妃答己(?–1322)與文宗后卜答失里(1307–1340)三人。<sup>5</sup>其中，答己與卜答失里更被尊為太皇太后。三人出身潢貴(弘吉剌部)，地位崇高，毋庸贅言，而在元朝中、後期帝位頻繁更迭之際，多居主導，影響深遠。這三位太后之中，答己的歷史地位尤為突出與重要。她出適順宗答剌麻八剌，生子海山(1281–1311)與愛育黎拔力八達(1285–1320)，迭為帝王。生女祥哥剌吉，既為著名的文藝愛好者，更是文宗皇后卜答失里的生母。此外，她在與成宗皇后卜魯罕(?–1307)的政爭中，與子愛育黎拔力八達進入大都取得政權，將帝位的承繼，由成宗一系移轉至順宗一脈，此後直至元亡，大致未變。海山兄弟繼立之際，答己欲以陰陽家之言勸退海山而未果，政治野心隱約可見。武宗一朝，答己尊貴榮顯；仁宗時期，權勢更臻頂峰。英宗得以順利繼立，她更是其中的關鍵。

答己的重要性已如前述，但對其人的研究尚不多見，至今似僅有一文，論述扼要概括，可惜頗有訛誤，<sup>6</sup>仍待深入與全面的研析。討論元中期政爭的學者，將答己視為具「有濃厚的游牧貴族思想意識」，「日常生活中較少接觸」儒臣，聯合鐵木迭兒(?–1322)等「蒙古保守貴族勢力」，反映「保守游牧貴族的利益」，並與英宗為首的「行漢法派」對抗。<sup>7</sup>這種以政治鬥爭歸諸文化衝突、忽略文化衝突以外其他現實政治因素的傾向，大有進一步討論的餘地。答己所生二子一女中，祥哥剌吉與其弟仁宗均為漢地藝文的贊助者與收藏家，可謂元中期皇室漢化漸深的關鍵人物。答己對中原文化的觀感如何？在子女文化興趣的養成上，有何作用？值得深究。本文試就答己與漢文化的關係略作考析，<sup>8</sup>敬希師友不吝指正。

<sup>3</sup> 關於祥哥剌吉收藏之宏富與對藝文的喜好，見傅申：《元代皇室書畫收藏史略》(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1年)，頁1–33。

<sup>4</sup> 陳高華〈元代女性的文化生活〉一文偶及皇室女性者，可以參見。該文載《暨南史學》第5輯(2007年)，頁66–86。

<sup>5</sup> 答己半身肖像，見圖一，今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原題順宗皇帝后塔濟。石守謙、葛婉章主編《大汗的世紀：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1年)收入此圖(圖版I-4，頁25)，並附解說(陳韻如撰，頁288)，可以參看。

<sup>6</sup> 郭德靜：〈論答己在元代政治鬥爭中所起的作用〉，《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5卷增刊(2003年)，頁202–4。此文伊始即誤稱答己為弘吉剌部特薛禪之孫、按陳之女，實則答己乃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亦即按陳曾孫女。

<sup>7</sup> 蕭功秦：〈元代政治改革的一場悲劇——英宗新政與「南坡之變」〉，載《蕭功秦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419–23。

<sup>8</sup> 本文所謂「漢文化」，類同於蕭啟慶所定義的「漢學」：範疇較「漢化」或「華化」為窄狹，指〔下轉頁91〕

## 答己的出身與出適

一個人的文化傾向，往往與其家庭背景有莫大關聯。茲就答己出身的家族與出適的家庭，略作討論，以見其與漢文化接觸的可能。

先從答己的本家談起。答己系出與蒙元統治者世代通婚的弘吉剌部，<sup>9</sup>但家世與出適前的事蹟，受資料所限，已難確考。目前僅知答己為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sup>10</sup>按陳係弘吉剌部孛思忽兒氏首領特薛禪之子，成吉思汗建國時被命統領弘吉剌部，受封千戶。蒙古伐金，時從木華黎(1170–1223)國王征戰，勳功顯赫。弘吉剌部的興盛，奠基於按陳的佐命之功，以致「女為后妃，男繼尚主，世戚之重，寵絕常品」，<sup>11</sup>極是貴顯。渾都帖木兒其人不詳，疑是按陳諸孫，可能既未尚主，亦無事功，遂難索考。答己被尊皇太后，有制「追崇四世之親」，目前僅見曾祖父(按陳)母

[上接頁90]

的是漢人所特有，尤其是士大夫所專擅的儒學、文學及美術。既不論及宗教與風俗習慣，也不包涵社會關係及認同問題。見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00–101。答己的宗教信仰是另一個可以注意的問題。過去以答己為藏傳佛教崇信者，但她對佛教其他宗派以及道教的贊助與護持，卻較為論者忽略。此一問題，筆者擬另文討論。

<sup>9</sup> 關於弘吉剌部與蒙元統治者的聯姻，參見宇野伸浩(著)、孟秋麗(譯)：〈弘吉剌部與成吉思汗系通婚關係的變遷〉，《蒙古學信息》1997年第2期，頁1–7，28。

<sup>10</sup> 宋濂等：《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卷一一六〈后妃傳二〉，頁2900；卷一一八〈特薛禪傳〉，頁2919。此外，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著錄有〈皇太后妹郕國夫人請秀公住持洞林寺疏〉，雙行小字注云：「行書，至大元年八月，在河南。」以時間而論，此處皇太后應即答己。若然，則答己似尚有妹，且受封為郕國夫人。實則不確。查吳式芬《金石彙目分編》亦著錄有〈金皇太后妹成國夫人請秀公住持疏〉，注：「行書，正大元年八月。」此條與繆氏所記，顯係一碑，碑刻年代，金元有別。按成國夫人，《金史》、《元史》俱無載；而郕國夫人，則四見於《金史》。其中有二條記載，值得注意：卷十七〈哀宗紀上〉，正大三年四月辛卯條，有「郕國夫人車經御路」云云；卷一二四〈忠義傳四·商衡〉，則記：「哀宗姨郕國夫人不時出入宮闈，干預政事，聲跡甚惡。」是郕國夫人為金哀宗太后之妹。《金石彙目分編》雖訛「郕」為「成」，但所記年代不誤。見繆荃孫：《藝風堂金石文字目》，《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影印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刊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年)，卷十六，頁一下；吳式芬(編)：《金石彙目分編》，《石刻史料新編》第一輯影印清光緒間(1875–1908)海豐吳氏文祿堂刊本，卷九之一〈開封府·滎陽縣〉條，頁二一上；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十七〈哀宗紀上〉，頁377；卷一二四〈忠義傳四·商衡〉，頁2697。

<sup>11</sup> 劉敏中(著)、鄧瑞全、謝輝(校點)：《劉敏中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卷三〈敕賜應昌府罔極寺碑〉，頁31。關於按陳事蹟的考察，參見張岱玉：〈元代漠南弘吉剌氏駙馬家族首領考論——特薛禪、按陳、納陳及其諸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6年第6期，頁56–57。

追封制書，<sup>12</sup>若非史闕有間，多少反映答己祖父至父輩弘吉剌部支系的出身，不足以為攀附誇耀的依據。《草木子》有答己為「一屠人婦」之說，縱難盡信，或非虛造。<sup>13</sup>

次論答己出適的家庭。答己夫順宗答刺麻八剌，乃世祖忽必烈(1215–1294)之孫，真金(1244–1286)第二子，母為真金元妃伯藍也怯赤。答刺麻八剌生平事蹟不詳，《元史》雖有傳，但甚簡略，且有可疑。據《元史》載，答刺麻八剌備受鍾愛，「凡乘輿巡幸及歲時朝賀」，始終隨侍真金左右。至元二十八年(1291)，答刺麻八剌二十八歲，始命出鎮懷州(今河南沁陽)，未至，因疾召還，明年五月八日卒。<sup>14</sup>答刺麻八剌兄甘麻剌(1263–1302)，至元二十三年(1286)出鎮漠北，「建藩開府，鎮護諸部」；<sup>15</sup>其弟鐵穆耳(1265–1307)則於至元三十年(1293)，受皇太子寶，撫軍北方。<sup>16</sup>三兄弟際遇相較，答刺麻八剌獲得重任之說，似難成立。《元史·順宗傳》所謂「優其出閤之禮」，其義難明。

元末明初著名的筆記《草木子》，所記元朝掌故，多有他書所未見者。該書卷四下〈雜俎篇〉有云：「世祖生子口啞，即裕宗。及壯，當有室。使其遊都市，使擇其意之所可者為妻。獨指一屠人婦，世祖即為娶之，迺姐吉妃子也。腹生二帝。」<sup>17</sup>姐吉，即答己。所謂「裕宗」應係「順宗」之誤，而「世祖」則當改正為「裕宗」。順宗生而口啞，藏文文獻《紅史》亦見記載。<sup>18</sup>明洪武十一年(1378)葉子奇因事下獄，獄中撰寫筆記，出獄遂成《草木子》，正德十一年(1516)由裔孫葉溥刊行。<sup>19</sup>《紅史》的作者蔡巴·貢噶多吉(1309–1364)任蔡巴萬戶長達二十八年，後出家，法名格微洛追，有「遍知司徒」之譽。他在1346年開始撰寫《紅史》，而於1363年成書。<sup>20</sup>葉子奇與蔡巴·貢噶多吉均歷蒙元統治，蒙元人記蒙元事，基本可靠；一漢一藏，同記一事，

<sup>12</sup>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影印清宣統二年(1910)陽湖陶氏涉園影刊洪武本(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年)，卷三〈皇太后故曾祖父追封濟寧王謚忠武按赤那演加追封魯王仍謚忠武制〉，頁十一上至十一下；同卷〈故曾祖母某氏追封魯忠武王妃制〉，頁十一下至十二上。

<sup>13</sup> 葉子奇：《草木子》(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四下〈雜俎篇〉，頁84。「一屠人婦」云云，「婦」字難以理解。妻乎？媳乎？女性通稱乎？都有可能，俟深考。

<sup>14</sup> 《元史》，卷一一五〈順宗傳〉，頁2895。順宗卒日的考定，詳見洪金富：〈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1分(2008年3月)，頁14–15。

<sup>15</sup>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元人文集珍本叢刊》影印元至治刊明代修補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卷四三〈總管范君和林遠行圖詩序〉，頁二上。

<sup>16</sup> 《元史》，卷十八〈成宗紀一〉，頁381。

<sup>17</sup> 葉子奇：《草木子》，卷四下，頁84。

<sup>18</sup> 蔡巴·貢噶多吉(著)、東嘎·洛桑赤列(校注)、陳慶英、周潤年(譯)：《紅史》(臺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年)，頁125。

<sup>19</sup> 《草木子·出版說明》，頁1。

<sup>20</sup> 《紅史·原作者介紹》，頁12–13。

應有所本。答刺麻八刺長侍其父身邊，出閣所就之國，又非大藩重地，或正因天生殘疾之故。《元史·順宗傳》不載其疾，疑出後人的隱諱。按〈順宗傳〉史源為《順宗實錄》，已佚。該《實錄》於至大元年(1308)由武宗下詔纂修，仁宗皇慶元年(1312)修成進呈。<sup>21</sup>武宗、仁宗俱為答刺麻八刺之子，子為父諱，不難想見。

真金少從著名儒士姚樞(1203–1280)、竇默(1196–1280)受《孝經》，留心學問，雅重儒士，愛好文藝，漢學造詣已具根底。<sup>22</sup>答刺麻八刺長年陪侍乃父，關係應極親近，是否得受漢式教育，史闕有間，無從得知。至元十五年(1278)至十九年(1282)間，真金妃闊闊真曾召阿失帖木兒(1249–1309)入內廷，以畏兀字學授成宗與甘麻刺，而未提及答刺麻八刺受教與否。<sup>23</sup>或以為答刺麻八刺能為墨竹畫，其說已經駁正，難以成立。<sup>24</sup>不過，真金對他人猶令「學漢人文字」，<sup>25</sup>其子甘麻刺暇時亦能命人「以國語講《通鑑》」，<sup>26</sup>家風所及，答刺麻八刺應受濡染，對漢文化有所涉及，十分可能。答刺麻八刺何時納答己為妃，史無明文，但略可考。長子海山生於至元十八年七月，以十月懷胎而言，答己之出適應不晚於至元十七年(1280)九月，時答刺麻八刺年方十七。嫁娶之際，真金尚在人世。嫁入如此重視漢文化的家庭，陪同夫婿長侍雅好中原文藝的家翁，答己想必不會對真金身邊的漢儒感到陌生。估計她與漢地藝文的接觸，可能始於此時。

真金遺孀闊闊真對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二位皇孫的教育頗為重視。就所知言，曾為皇孫保傅輔迪者，計有董文用(漢人，1224–1297)<sup>27</sup>、李孟(漢人，1255–1321)<sup>28</sup>、阿失帖木兒(畏兀人)<sup>29</sup>、乞台普濟(唐兀人，?–1318)<sup>30</sup>四人。其中，董、

<sup>21</sup>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頁497；卷二四〈仁宗紀一〉，頁554。

<sup>22</sup> 同上注，卷一一五〈裕宗傳〉，頁2888–92。關於真金與漢文化，參見吉川幸次郎：〈元の諸帝の文学——元史叢説の一〉，載《吉川幸次郎全集》(東京：筑摩書房，1969年)，第15卷《元篇下·明篇》，頁236–37；H. Franke, “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Asia Major*, n.s., 3, pt. 1 (1953), pp. 30–31。

<sup>23</sup>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七〈武都忠簡王神道碑〉，頁三上。

<sup>24</sup> 蕭啟慶：〈元代蒙古人的漢學〉，頁182–83。

<sup>25</sup> 《元史》，卷一一五〈裕宗傳〉，頁2891。

<sup>26</sup> 同上注，〈顯宗傳〉，頁2893。

<sup>27</sup> 至元二十七年(1290)，由闊闊真具奏，世祖命授皇孫經。見虞集(著)、王頌(點校)：《虞集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翰林〔學士〕承旨董公(文用)行狀〉，頁856。另見《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傳〉，頁3500。

<sup>28</sup> 黃潛(著)、王頌(點校)：《黃潛全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忠李公(孟)行狀〉，頁419。另見《元史》，卷一七五〈李孟傳〉，頁4084。

<sup>29</sup>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七〈武都忠簡王神道碑〉，頁三上。

<sup>30</sup> 姚燧：《牧菴集》，《四部叢刊正編》影印上海涵芬樓藏武英殿聚珍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卷二六〈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史公先德碑〉，頁二上。

李、阿三人即為闊闊真所命或建請，乞台普濟則「侍裕宗于東宮將二十年」，<sup>31</sup>與闊闊真關係應亦密切。阿失帖木兒父為孟速思(1206–1267)，其時「凡詔誥、典祀、軍國、期會，皆襲用畏兀書」，孟速思十五歲「盡通其學，冠諸部」，諸子之中「世其學者」，唯阿失帖木兒一人。<sup>32</sup>至元十五年，阿失帖木兒從征有功，授從仕郎、樞密院都事。後被闊闊真「召入內廷，以字學訓成宗、晉王」。所謂「字學」，應為阿失帖木兒家傳的畏兀字學。大德二年(1298)，遷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復受命輔迪海山與愛育黎拔力八達兄弟，可能亦以畏兀字學教導二人。<sup>33</sup>阿失帖木兒之外，董、李、乞三人均係以經學教授海山兄弟。元人姚燧(1238–1313)所謂「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為治國平天下之具」，說明的正是闊闊真以漢學教育二位皇孫的情形。<sup>34</sup>答己「盛年寡居」，留居大都(今北京)侍奉闊闊真，<sup>35</sup>闊闊真延師以教其子，答己理應有所接觸。李孟於答己出居覃懷時，即係以「宮僚」身份侍從，「在覃懷四(二)年，夷險一節，信任益專」，<sup>36</sup>「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sup>37</sup>

答己尚在本家之時，是否得與漢文化接觸，難以徵知，但出適答刺麻八剌後，以至於往居懷州，身處於漢學風氣頗盛的環境，應不乏沾染漢文化的機會。當然，這尚止於間接的推測，還需要直接的證據說明。

### 王振鵬〈歷代聖母賢妃圖〉的啟示

先從王振鵬的一幅畫作談起。王振鵬(約1280–約1329)，<sup>38</sup>一作振朋，字朋梅，永嘉(今浙江溫州)人。王氏為元代著名的界畫家，乃一典型的宮廷畫家，備受仁宗

<sup>31</sup> 同上注。

<sup>32</sup>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七〈武都忠簡王神道碑〉，頁二下至三上。

<sup>33</sup> 同上注，頁三上。

<sup>34</sup> 姚燧：《牧菴集》，卷十一〈普慶寺碑〉，頁六上。另外，祥哥刺吉「以天人之姿，誦習經史」，說明應亦受漢文古典教育，見駱承烈(彙編)：《石頭上的儒家文獻——曲阜碑文錄》(濟南：齊魯書社，2001年)，〈至大元年皇妹大長公主祭孔廟碑〉，頁256。或即在闊闊真命人教授海山兄弟之時。

<sup>35</sup> 屠寄：《蒙兀兒史記》(臺北：世界書局，1962年)，卷十九〈后妃傳〉，頁十二下。

<sup>36</sup> 《黃潛全集》，〈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忠李公(孟)行狀〉，頁419。〈行狀〉與《元史》本傳俱載李孟隨答己母子往居懷州，前後凡四年。按答己母子大德九年(1305)七月出居，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成宗卒後，即返大都爭位，期間實不滿二年。姚燧所謂「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誠是，茲據改。見姚燧：《牧菴集》，卷二六〈河內李氏先德碣〉，頁七下。

<sup>37</sup> 《元史》，卷一七五〈李孟傳〉，頁4084。

<sup>38</sup> 王振鵬生卒年的推定，係從翁同文之說，見其〈畫人生卒年考〉，載翁同文：《藝林叢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7年)，頁38–41。

(1311–1320在位)眷愛，賜號「孤雲處士」。雅擅界畫之外，人物、山水亦為所長。<sup>39</sup>存世作品之中，有〈歷代聖母賢妃圖〉卷，另見〈十妃圖〉、〈十賢后妃圖〉、〈獻聖母圖〉等異稱。<sup>40</sup>國立故宮博物院(以下簡稱故宮)藏有此圖卷，題〈元王振鵬畫手卷〉，一卷，絹本，十幀，引首、拖尾則為紙本，並見題跋。《故宮書畫錄》與《故宮書畫圖錄》俱有著錄。<sup>41</sup>全卷繪西周至宋代十位皇后，或規諫帝王，或愛民聽政，均著賢名於後世。畫家以臺閣界畫為背景，輔以人物畫像，摹寫當時場景之外，又以楷書題敘故實於旁，圖文並茂，相輔相成。

引首題跋，有助了解圖卷來歷，並開展相關問題的討論。茲據故宮藏本(見圖二)，並參歷來著錄，<sup>42</sup>釋錄全文如下：

至大三年〔1310〕冬十月，<sup>43</sup>伏蒙皇上朝興聖宮，<sup>44</sup>上皇太后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文皇太后」，<sup>45</sup>大赦天下，慶溢宮廷，歡騰海滙。<sup>46</sup>是日，宴臣阿沙不花等於五花殿中，寵賜鈔帛。<sup>47</sup>臣等捧觴稱賀，隨蒙皇太后命臣等登記名

<sup>39</sup> 王振鵬小傳與相關史料，詳見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頁418–25。

<sup>40</sup> 為求行文一致，以下援稱該圖卷，均用〈歷代聖母賢妃圖〉一名。王振鵬存世作品的考列，詳見James Cahill, *An Index of Early Chinese Painters and Paintings: T'ang, Sung, and Yua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 335–37。

<sup>41</sup> 編號「調一八五72」。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纂委員會(編)：《故宮書畫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5年增訂本)，冊四，卷八，頁38。圖影另見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故宮書畫圖錄》第17冊(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8年)，頁227–32。

<sup>42</sup> 諸書著錄該圖卷引首題跋全文者，有《圖畫精意識》、《愛日吟廬書畫錄》、《夢園書畫錄》、《古芬閣書畫記》、《眼福編·二集》，分見張庚：《圖畫精意識》，《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槐廬叢書》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聖母圖〉，頁十八上至十八下；葛金焯：《愛日吟廬書畫錄》，《歷代書畫錄輯刊》影印清宣統二年(1910)當湖葛氏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卷一〈元王振鵬歷代聖母賢妃圖卷〉，頁七上至十一下；方濬疏：《夢園書畫錄》，《歷代書畫錄輯刊》影印清光緒三年(1877)定遠方氏刊本，卷五〈元王孤雲歷代聖母賢妃圖〉，頁二九上至三六上；杜瑞聯：《古芬閣書畫記》，收入《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卷十三〈元王孤雲歷代聖母賢妃圖卷〉，頁三二上至三七下；楊恩壽：《眼福編·二集》，收入《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卷十四〈元王孤雲歷代聖母賢妃圖卷〉，頁二六上至三一上。為免煩冗，下文據以參校故宮藏本，某書但有異文，出注說明時，注文不再詳引該書卷頁。

<sup>43</sup> 《愛日吟廬書畫錄》無「冬」字。

<sup>44</sup> 《夢園書畫錄》無以上八字。

<sup>45</sup> 《圖畫精意識》「儀」字下脫「天」字。另，諸家著錄俱將「壽文」作「壽元」。

<sup>46</sup> 《愛日吟廬書畫錄》無「歡騰海滙」四字，《夢園書畫錄》無「慶溢宮廷，歡騰海滙」八字。

<sup>47</sup> 《圖畫精意識》「寵賜」作「寵錫」，《夢園書畫錄》與《愛日吟廬書畫錄》均無「阿沙不花」與「寵賜鈔帛」八字。

氏於圖首，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sup>48</sup> 臣等竊惟皇太后德邁前賢，望隆往哲，覩圖思警，借古繩今，用供寶玩，繪臣垂休。臣等無任欣賀懇祈之至。<sup>49</sup> 臣阿沙不花、孛羅帖木兒、塔思不花、完澤、脫虎脫、李孟、三寶奴、李邦寧。<sup>50</sup>

先說明題跋代表的意義。其一，答己既命王振鵬描畫歷代賢后圖，又於奉上尊號的歡欣慶賀之際，在大內宴飲時出示群臣觀題留名，「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成就一段難得的圖畫因緣，更彰顯答己的藝術品味。答己有觀藏圖畫的雅興，與過往論者以為她對漢文化瞭解未深，甚或有所排斥，實係大相逕庭。其二，〈歷代聖母賢妃圖〉並非一般人物畫，藝術收藏「用供寶玩」的意義之外，復含歷史鑑戒的意涵。文中所謂「覩圖思警，借古繩今」，誠如章學誠（1738–1801）所言：「鵬能於藝事效忠，圖獻歷代聖母賢妃以寓規諷，其可貴不獨在丹青已也。」<sup>51</sup> 這是王振鵬的用心所在，也為歷來著錄該圖者所表彰。不過，答己能雅重王振鵬的「藝事」，附庸風雅，已屬難能可貴，畫外的規諷之意是否可以體會，值得關注。

書畫資料運用於歷史研究，先決條件自然是其本身的屬真品，至少應是有所本的仿摹之作。上述二點意義的成立，亦須立基於此標準之上。故宮於其建置的「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資料庫著錄此卷，內容簡介有「雖然構局扼要，但整體用筆風格，已非元人筆墨」云云，<sup>52</sup> 這是就書畫運筆特色而作的推論，說明圖畫可能並非元

<sup>48</sup> 《圖畫精意識》作「隨蒙皇太后手示臣等王振朋所進〈歷代聖母賢妃圖〉十冊，臣等恭閱一過，還至御前，復蒙命臣等登記名氏於圖首，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夢園書畫錄》作「遂蒙皇太后示臣等以王振鵬所進〈歷代聖母賢妃圖〉十幅，臣等恭閱一過，復蒙命臣等登記名氏於圖首，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愛日吟廬書畫錄》作「隨蒙皇太后手示王振鵬所畫〈歷代聖母賢妃圖〉十幅，臣等恭閱一過，復蒙命臣等登記名氏於圖首，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古芬閣書畫記》與《眼福編·二集》作「隨蒙皇太后手示臣等以王振鵬所進〈歷代聖母賢妃圖〉十冊，臣等恭閱一過，還至御前」。

<sup>49</sup> 「臣等……懇祈之至」，《圖畫精意識》作「臣等竊惟皇太后德邁前人，望隆往哲，覩圖思警，借古繩今，此振朋懇懇之丹忠，實臣等殷殷之素願。用供寶玩，□姬圖而媲美；敬擬箴銘，嗣雲圖以垂休。臣等無任欣賀懇祈之至」。《夢園書畫錄》作「唯願皇太后覩圖思警，借古繩今，用供寶玩，並姬圖而媲美，敬擬箴銘，嗣虞繪以垂休。臣等無任忻賀懇祈之至」。《愛日吟廬書畫錄》作「臣等竊惟皇太后德邁前人，望隆往喆，覩圖思警，借古繩今，此振鵬懇懇之丹衷，臣等殷殷之素願。用供寶翫，並姬圖而媲美；敬擬箴銘，嗣虞繪以垂休。臣等無任欣賀懇祈之至」。《古芬閣書畫記》與《眼福編·二集》俱作「皇太后德邁前人，望隆往哲，覩圖思警，借古繩今，臣等無任欣賀懇祈之至」。

<sup>50</sup> 《圖畫精意識》僅題七人名，無「李邦寧」。《夢園書畫錄》與《愛日吟廬書畫錄》於八人題名前均冠「臣」字。諸家著錄皆以「李孟」為「李益」。

<sup>51</sup> 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卷二九〈外集二·書元人墨蹟後〉，頁322。

<sup>52</sup> 前引故宮著錄此畫的《故宮書畫錄》與《故宮書畫圖錄》，未見相關文字，應是建置資料庫時所增。引文見「故宮書畫典藏資料檢索」，網址為[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24261&type=1](http://painting.npm.gov.tw/npm_public/System/View.jsp?ObjectID=24261&type=1)（檢索日期：2011年4月7日）。



人之作。不過，既疑非元人畫作，卻仍歸入王振鵬名下，此乃證據不足，不得不然。書畫鑑別，非我所長，但此畫疑為偽作，引首題跋尤屬後人偽託，理由如下。

先論此圖疑為偽作。流傳有緒，著錄詳實，可謂鑑別書畫的重要基準。就所知言，元代文獻並無〈歷代聖母賢妃圖〉繪作的明確記載。最早載及該圖者，應是明人徐象梅的《兩浙名賢錄》，云：「王振鵬……嘗奉詔作〈十妃冊〉，藏之內府。楊文正公忽於燕市中得之，以為一段奇事，什襲而題其後，以為子孫世寶。其為鉅公所重如此。」<sup>53</sup>楊文正公，其人不詳；奉詔作畫云云，所據未明。《四庫全書總目》曾評《兩浙名賢錄》，認為是書「所列之人，本正史者十僅二三，本地志者乃十至六七，以鄉閭粉飾之語，依據成書，殆亦未盡核實矣」。<sup>54</sup>說明未得佐證以前，我們對此書所載，應抱持懷疑的態度。徐象梅之後，清代著錄書畫的書籍，對〈歷代聖母賢妃圖〉多有記載，或係出自家藏，或係寓目記聞，引首題跋、收傳印記與拖尾款識頗見差異，<sup>55</sup>可知此圖應有數種摹本。不過，綜觀現存著錄此圖較詳諸書，我們既無法見

<sup>53</sup> 徐象梅：《兩浙名賢錄》，《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縮印明天啟徐氏光碧堂刻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卷四八〈方技·元·孤雲處士王振鵬〉，頁四五上。

<sup>54</sup> 永瑢、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清乾隆間武英殿刊、嘉慶間後印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卷六二〈史部十八·傳記類存目四〉，頁二七上。

<sup>55</sup> 清代以來著錄，除前揭著錄該圖卷引首題跋全文者外，尚見王士禛（著）、袁世碩（主編）：《王士禛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第6冊《雜著·居易錄》，卷二八，頁437-38；曹錕：《所藏書畫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清嘉慶十年〔1806〕歙縣石鼓硯齋曹氏稿本），冊二〈元王振鵬畫古賢后十冊〉，頁六八上至六八下；楊恩壽：《眼福編·初集》，收入《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卷九〈元王孤雲歷代聖母賢妃圖卷跋〉，頁三三上至三三下；楊恩壽：《眼福編·三集》，收入《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卷六〈元王孤雲聖母賢妃圖贊〉，頁九上；夏荃：《退庵筆記》，《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清鈔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六〈北山寺〉，頁431；方裕謹：〈溥儀賞溥傑皇宮中古籍及書畫目錄（下）〉，《歷史檔案》1996年第2期，頁63；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賞溥傑書畫目》（北平：國立故宮博物院，1934年），頁十一下。現可徵知收藏此圖者，除故宮外，尚有中國大陸北方某收藏家與江蘇泰州光孝寺。見安介生：〈書畫雙絕，藝林瑰寶——元王振鵬《歷代聖母賢妃圖》鑑賞〉，《書法報》（武漢）第42期，2006年10月18日，第16版；泰州市博物館「文博大觀·泰州光孝寺」，網址：[http://www.taizhou.gov.cn/art/2010/2/20/art\\_1739\\_53130.html](http://www.taizhou.gov.cn/art/2010/2/20/art_1739_53130.html)（檢索日期：2011年4月7日）。故宮書畫多承清室而來，所藏〈聖母賢妃圖〉，名列溥儀以賞賜溥傑為名而盜運出的歷代書畫手卷之中，早已佚失，今藏此畫，或是摹本。此外，引首題跋，至少在章學誠時，已與原圖割而並行，並被視為元人書跡，收入法帖書中。見章學誠：《章學誠遺書》，卷二九〈外集二·書元人墨蹟後〉，頁322；梁廷柟：《藤花亭書畫跋》，收入《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7年），卷三〈宋元書合冊〉，頁1026；容庚：《叢帖目》（香港：中華書局，1980-1986年），第2冊，卷七〈歷代七·清三·寄暢園法帖六卷〉，頁537。

到「楊文正公」所「題其後」之文字，而收傳印記與拖尾題識，又俱出明清時人之手，<sup>56</sup>更令人不能無疑。拖尾題跋的問題，可以故宮藏本為例。故宮藏本拖尾處，有明人王芾（一作王紱，號友石生，1362–1416）與姚綬（1423–1495）題跋二款。王芾所題有年月可稽，其時繫洪武四年（1371），芾年方十齡，顯是後人假冒之作。

次辨引首題跋應為偽託。跋文所謂皇太后，指的是武宗生母答己，應無可疑。上太后尊號與大赦天下，《元史》俱載其事，歷歷可考。<sup>57</sup>不過，後人假託之跡殊為明顯，約有三端：

一、題畫者之一的阿沙不花（1263–1309）卒於至大二年，<sup>58</sup>不得於隔年有題署圖卷之舉。<sup>59</sup>清人孫爾準（1772–1832）已經指出，這是題跋「作偽之不可掩者也」。<sup>60</sup>

二、〈歷代聖母賢妃圖〉，後世仿摹，不只一本。引首題跋，諸本文字之脫增以至於改動，出入既多，各有誤謬，難以憑信。可以故宮藏本為例。該本「隨蒙皇太后命臣等登記名氏於圖首，以彰一時君臣相得之盛」兩句，文意欠通，頗顯突兀。諸家著錄殊異，甚至有三十餘字之差別。又如誤所進太后尊號「壽元」為「壽文」，更是於史未合。<sup>61</sup>不過，諸本所見觀題諸臣之一的李益，《元史》凡一見，云：「〔至元十一年〕十二月，以黑的為高麗達魯花赤，李益受代還。」<sup>62</sup>至元十一年（1274）至此時（1310），已相去三十七年。元代中期未聞李益事蹟。故宮藏本以「李益」為「李孟」。李孟與答己一家關係親近，至大三年官任「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徽政院事」，<sup>63</sup>列名進賀眾臣之中，實有可能。

<sup>56</sup> 曹錕《所藏書畫錄》錄元人李衍（1245–1320）題跋一則（頁六八上至六八下），跋文未署年月，且不無可疑之處。其一，隻字未及引首題跋與答己藏畫。其二，既誤仁宗所賜王振鵬之號「孤雲」以為其字，又以振鵬「水墨、界畫不免微傷」，均與史實不相符合。其三，跋文認為振鵬「此卷出入大小李之間」，將之比附為雅擅山水畫的唐朝畫家大小李將軍，後且有「觀者勿以尋常金璧視之」云云，是以此卷為金碧山水畫作。總而言之，李衍之跋，若非曹錕筆誤，即出後人偽託。

<sup>57</sup>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頁527，528。另，尊號玉冊文與赦文，今仍可見，均由姚燧執筆，見姚燧：《牧菴集》，卷一〈皇太后尊號玉冊文〉，頁三上至四上；同卷〈至大三年十月赦〉，頁四下至五下。

<sup>58</sup> 《元史》，卷一三六〈阿沙不花傳〉，頁3299。

<sup>59</sup> 或以題跋文字為阿沙不花所書，然自跋文內容而言，實難推知撰書之人，何況阿沙不花早已卒逝。參看王乃棟：〈西域少數民族書法家遺存作品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1期，頁84。

<sup>60</sup> 孫爾準：《泰雲堂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文集卷二〈元人墨蹟跋〉，頁一下。

<sup>61</sup> 《元史》，卷二三〈武宗紀二〉，頁527。

<sup>62</sup> 同上注，卷二〇八〈外夷傳一·高麗〉，頁4620。

<sup>63</sup> 同上注，卷一七五〈李孟傳〉，頁4087。

三、目前可以徵知引首題跋落款用印，鈐於首二行字中，各本有所不同。故宮藏本所鈐為「興聖宮之御寶」陽文方章朱印，《古芬閣書畫記》與《眼福編·二集》所記鈐印為「御府之珍」朱文方璽，《夢園書畫錄》則載鈐有「御府之寶」。「興聖宮之御寶」、「御府之珍」與「御府之寶」三印，既未在其他元代書畫收藏璽印中見到，各本仿摹而有鈐印之不同，亦令人不能無疑。

〈歷代聖母賢妃圖〉圖跋俱偽，已如上述。查檢〈歷代聖母賢妃圖〉著錄時，杜瑞聯《古芬閣書畫記》對王振鵬該畫論贊較多，引起筆者的注意。其贊雖不免對振鵬讚譽有加，其論則對答己稱頌備至。論者目的有二：其一係將答己塑造為聖母賢妃的完美形象，而以「三代下之賢后」譽之。文內舉二例為證，以賣簪珥賑河北饑為慈，以嚴懲黷戲宮婢幾斃做沖齡皇帝為嚴，並明言證據稽考自《元史》。其二是間接推崇王振鵬的苦心，及以圖畫寄寓諷諷的優越性。文中替答己設身處地，認為諫臣若每天用古人事蹟為勉，不是諂媚，即是迂腐。圖畫寓諷，收效最佳，「非忠言讜論所可及也」。<sup>64</sup>

由於〈歷代聖母賢妃圖〉並非真跡，上引論者目的的第二點不免過度推衍之嫌，但就第一點所言，可謂一反答己予人「正位東朝，淫恣益甚，……濁亂朝政，無所不至」的印象，<sup>65</sup>因而有深究的必要。先論此段文字的作者。前引文亦見收於楊恩壽（1835–1891）《眼福編·初集》，一字不易。<sup>66</sup>《古芬閣書畫記》係清人杜瑞聯（咸豐間進士）記其所藏書畫之作，所錄各種書畫，後俱有論贊，其文多見於楊恩壽《眼福編》，實因「恩壽當時在其〔杜瑞聯〕幕府，故為之捉刀」所致。<sup>67</sup>此段文字應為楊氏所作。次言所論是否的當。楊恩壽所謂考稽《元史》所得例證，筆者屢求覆驗，迄無所得，不能無疑。按恩壽既為杜瑞聯代庖，每於公暇時日撰寫三、四則跋語，著名書畫賞鑑學者余紹宋（1883–1949）認為「鑑賞而逼促若是，宜其不審矣」，致有「聞而知其偽者，猶連篇累牘，知其仍無真知灼見也」。<sup>68</sup>所謂考《元史》所得二證，頗疑是「不審」以致誤，甚或是向壁而虛造。

總而言之，〈歷代聖母賢妃圖〉圖跋可能出於後人偽託，但就重新評估答己對漢文化的認知，仍具啟示作用。我們尚無法徵知此畫偽造之所本，但答己喜愛漢地的繪畫，卻非無跡可尋。至大元年三月，武宗給鈔五萬錠、絲二萬斤，命建興聖宮，以為答己太后居所。<sup>69</sup>工事告竣，答己即命何澄（1223–?）總理繪事。按何氏，大都

<sup>64</sup> 杜瑞聯：《古芬閣書畫記》，卷十三〈元王孤雲歷代聖母賢妃圖卷〉，頁三七上至三七下。

<sup>65</sup>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頁2902。

<sup>66</sup> 楊恩壽：《眼福編·初集》，卷九〈元王孤雲歷代聖母賢妃圖卷跋〉，頁三三上至三三下。

<sup>67</sup> 余紹宋：《書畫書錄解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1932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排印本），卷六〈第六類·著錄·三·一家所藏·古芬閣書畫記〉，頁二三上。

<sup>68</sup> 同上注，卷五〈第五類·題贊·三·名蹟跋·眼福編〉，頁十一上。

<sup>69</sup> 《元史》，卷二二〈武宗紀一〉，頁497。

人，雅擅界畫，並及歷史人物故事畫與鞍馬畫等。<sup>70</sup>答己命總興聖宮繪事，即係借重其繪畫才能。以漢人畫師圖畫日常起居宮殿，生活環境的文藝氣息，可以想見。延祐元年(1314)，仁宗亦曾命著名畫家李衍於嘉熙殿壁繪竹，<sup>71</sup>可見附庸風雅，母子皆然，並無齟齬。進一步來說，備受仁宗嘉賞與尊禮的畫家何澄與儒臣李孟，<sup>72</sup>同樣受到答己的賞識。母子對於儒臣文士的親禮，相當一致。

### 答己與趙孟頫

就現存資料而言，答己與趙孟頫(1254–1322)的交集較多，值得注意。答己曾先後命孟頫書寫興聖宮匾額，<sup>73</sup>撰寫碑記，<sup>74</sup>並納其言改隆福宮名為光天，<sup>75</sup>在在顯示對趙氏傑出的書法與文學才能極其看重。此外，趙孟頫曾奉懿旨撰〈題耕織圖二十四首〉古詩，以正月至十二月的「耕」與「織」為小題，分賦一詩，詩各五言，八韻十六句，刻畫入微。<sup>76</sup>元代懿旨的頒發，或皇后，或太后，或妃子，或公主，都有可能。趙氏詩文集完整收錄此組詩作，可惜未能提供懿旨主人或撰作年代的線索。所幸孟頫

<sup>70</sup> 陳高華：《元代畫家史料匯編》，頁412–17。

<sup>71</sup> 《虞集全集》，〈同開先南楚悅禪師觀息齋畫竹卷於……因記延祐甲寅，息齋奉詔寫嘉熙殿壁，……〉，頁57。

<sup>72</sup> 皇慶元年，何澄進獻界畫，年已九十，因得仁宗寵眷，原以太中大夫、秘書監致仕，此時更超賜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見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九〈題何澄界畫三首〉，頁十三下至十五上。

<sup>73</sup> 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四〈前輩謙讓〉，頁49。

<sup>74</sup> 趙孟頫〈仁濟橋記〉載：「以瑞州錦江橋新成，宜錫嘉名，立石旌美，啟聞，有旨命臣孟頫製橋名及撰文紀事。」「有旨」云云，易令人以為係奉皇帝(武宗)旨意，實則不然。據時人柳貫所撰〈瑞州新修仁濟橋記〉云：「橋舊即江以名，而今榜『仁濟』，昭獻元聖皇后所錫命。」可知下旨命趙孟頫制名與撰文者，應係答己。事實上，當時瑞州已為答己湯沐，境內橋成，按理亦應由答己頒旨賜名。見鄺璠等(修)、熊相等(纂)：《正德瑞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影印明正德刊本(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年)，卷十三，趙孟頫〈仁濟橋記〉，頁四十上至四二上；柳貫(著)、柳遵傑(點校)：《柳貫詩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卷十四〈瑞州新修仁濟橋記〉，頁289。此外，趙孟頫曾奉懿旨撰〈敕建大興龍寺碑銘〉，見趙孟頫(著)、任道斌(校點)：《趙孟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九，頁199–200。該碑原由柳貫代作，見《柳貫詩文集》，卷九〈懷州大興龍寺碑銘〉，頁180–82。

<sup>75</sup> 《趙孟頫集·附錄》，楊載〈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行狀〉，頁274。並見歐陽玄(撰)、歐陽銘鏞(編集)：《圭齋集》，《四部叢刊正編》重印上海涵芬樓景印明成化刊本，卷九〈元翰林學士承旨……趙文敏公神道碑〉，頁十五上至十五下。趙孟頫《元史》本傳不記此事，見《元史》，卷一七二，頁4018–23。

<sup>76</sup> 《趙孟頫集》，卷二，頁26–32。趙孟頫題詩的分析，見單人耘：〈淺談元代趙孟頫的題耕織圖詩〉，《中國農史》1988年第2期，頁125–32。中國耕織圖繪畫的傳統，概見周昕：〈中國《耕織圖》的歷史和現狀〉，《古今農業》1994年第3期，頁54–62。

〈題耕織圖〉詩墨寶，並未隨元室滅亡而湮沒，尚得見諸清代內府書畫的專書《石渠寶笈》。該書卷三著錄〈元趙孟頫題耕織圖詩〉，<sup>77</sup>所載首幅前款有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趙孟頫，奉懿旨恭撰〈題耕織圖二十四首〉，伏塵睿覽。」末幅又有識，云：「大元延祐五年〔1318〕四月二十一日，臣趙孟頫謹書。」落款年月時所署官職，與史相合。<sup>78</sup>答己既與趙孟頫頗有交集，孟頫延祐五年奉旨撰詩，應仍是來自答己的旨意。<sup>79</sup>

趙孟頫另文〈農桑圖序〉有云：

延祐五年四月廿七日，上御嘉禧殿，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大司徒臣源進呈〈農桑圖〉。上披覽再三，問：「作詩者何人？」對曰：「翰林承旨臣趙孟頫。」「作圖者何人？」對曰：「諸色人匠提舉臣楊叔謙。」上嘉賞久之，……又命臣孟頫敘其端。……此圖實臣源建意，令臣叔謙因大都風俗，隨十有二月，分農桑為廿有四圖，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又俾翰林承旨臣阿憐帖木兒用畏吾兒文字譯于左方，以便御覽。<sup>80</sup>

此序係奉仁宗敕命撰寫。所謂「因其圖像作廿有四詩」，令人聯想到前奉懿旨所作〈題耕織圖二十四首〉。依進呈時序，楊叔謙所繪〈農桑圖〉，應即〈耕織圖〉，一圖而異名也。不過，四月廿一日奉懿旨所撰〈題耕織圖二十四首〉，與廿七日進呈仁宗的〈農桑圖〉，似為二物。理由有二：一是既奉懿旨撰呈，不太可能在六天後又再行上陳仁宗。二是據〈農桑圖序〉所載，〈農桑圖〉有詩有圖，前既有趙孟頫序文，左方復見畏吾兒文字的譯語，與《石渠寶笈》著錄的〈題耕織圖詩〉顯異。此外，序文記〈農桑圖〉的繪作，出自「大司徒臣源」的建議。臣源即羅源，原為徽政院使，仁宗至大四年（1311）十一月加封大司徒，<sup>81</sup>英宗至治二年（1322）正月以徽政院使身份被流放。<sup>82</sup>徽政院是元代為太后專門設置的官署，院使乃太后親信重臣。<sup>83</sup>筆者有一假設：羅源

<sup>77</sup> 張照、梁詩正等：《石渠寶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貯乾清宮三·列朝人書畫〉，頁十二下至十四上。

<sup>78</sup> 趙孟頫於延祐三年（1316）七月起署該銜至其歿，見《趙孟頫集·附錄》，楊載〈大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趙公行狀〉，頁273。

<sup>79</sup> 故宮現藏〈元趙孟頫耕織圖詩卷〉，與《石渠寶笈》著錄者頗異，前款既僅見「耕織圖二十四首，奉懿旨撰并書。集賢直學士臣趙孟頫」，更無末幅識語。拖尾題跋者，《石渠寶笈》記為元人虞集，故宮藏本則為明成化辛未（成化年間無此干支）吳寬（1435–1504）跋。故宮藏本疑出後人仿摹。見《故宮書畫錄》，冊四，卷八，頁3。

<sup>80</sup> 《趙孟頫集·外集》，頁231。

<sup>81</sup>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頁548。

<sup>82</sup> 同上注，卷二八〈英宗紀二〉，頁619。

<sup>83</sup> 元代太后政治權力的運作，徽政院的作用至關重要，筆者擬另文考述。關於徽政院置廢的考察，參看方廣錫：〈元史考證兩篇〉，《文史》第29輯（1988年），頁229–40。

既為答己所親任，雖命楊叔謙繪〈農桑圖〉以進上仁宗，或亦已陳報答己知悉，答己欣賞趙孟頫的書法、文學，遂頒旨命趙氏題詩。詩成呈奉答己「睿覽」，<sup>84</sup>六天後，李邦寧與羅源再以〈農桑圖〉（有詩有圖）進呈仁宗。

答己所以命趙孟頫為〈耕織圖〉題寫詩句，既是雅重孟頫的書法與詩藝，也是她能留心農桑與民間生活的表現。這並非偶然之舉，《元史》本傳說答己既教宮女「執治女功」，自己更係「親操井臼」，<sup>85</sup>對趙孟頫詩句所指「幼婦頗能家，井臼常自操」，<sup>86</sup>以及紡織女功之種種，想必頗能體會。答己對農稼的重視，亦見諸文獻記載。據《元史》載，至大四年閏七月，仁宗車駕自上都返還大都，答己考量「秋稼方盛，勿令鷹坊、駝人、衛士先往，庶免害稼擾民」，有敕予以禁止。<sup>87</sup>《元史》所載，業經刪節潤飾，《通制條格》雖不免節略之跡，但所記更為原始、完整與寫實。據《通制條格》可知，此事原係答己認為「昔寶赤、帖滅赤每并怯薛人等，教先去呵，搔擾百姓每踏踐田禾有。百姓沒田禾呵，怎生過？咱每無百姓呵，怎生行？飛放的每，咱每根底得甚濟有？」遂命李孟提調禁止，並向仁宗陳奏以行。<sup>88</sup>禁止騷擾百姓，踐踏田禾，雖為元廷歷來所嚴申，<sup>89</sup>但收效可能有限。答己能著眼於此，重申禁令，愛惜民力，不言可喻。前此，答己出居懷州，以宮僚身份從行的李孟，得「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sup>90</sup>可能即係答己的授權。總之，在重視農桑方面，答己與仁宗母子可謂契合。

趙孟頫於南宋亡後十年，應徵仕元，此後沉浮宦途三十餘載。在世祖與仁宗二朝，孟頫最受賞識提拔。仁宗欣賞趙氏在文學藝術上的成就，視為「文學侍從之臣」，破格拔擢，恩寵有加。<sup>91</sup>對趙孟頫的重用，我們再度看到答己母子在文藝喜好心態上的一致。此外，答己對趙孟頫妻管道昇（1262–1319）也予禮遇，時於興聖宮設宴接待，「恩意優渥」。<sup>92</sup>虞集（1272–1348）有詩記其事：「夫人盛名譽，輒宴興聖宮。」

<sup>84</sup> 趙孟頫詩作，即連仁宗尚須譯以畏兀字，「以便御覽」，答己想必更難直接閱讀並理解。「睿覽」云云，想亦另有人譯解。

<sup>85</sup>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頁2902。

<sup>86</sup> 《趙孟頫集》，卷二，頁26。

<sup>87</sup>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頁545。

<sup>88</sup> 完顏納丹等（纂集）、方齡貴（校注）：《通制條格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卷十六〈田令·司農事例〉，頁474。

<sup>89</sup> 同上注，頁470–74。

<sup>90</sup> 《黃潛全集》，〈元故翰林學士承旨……謚文忠李公（孟）行狀〉，頁419。點校者王頌此處讀為「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筆者以為應作「以宮僚從，戢衛卒，無敢侵奪民居」。

<sup>91</sup> 陳高華：〈趙孟頫的仕途生涯〉，載《陳高華文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頁252–68。

<sup>92</sup> 《趙孟頫集·外集》，〈魏國夫人管氏墓志銘〉，頁245。

餘情寄墨君，頃刻生清風。」<sup>93</sup>似非純粹愛屋及烏，管氏所擅的墨竹，既受到仁宗的賞識，也可能獲得答己的欣賞。

### 答己與漢族典籍

回到《元史》答己本傳的評價：「后性聰慧，歷佐三朝，教宮中侍女皆執治女功，親操井臼。然不事檢飭，自正位東朝，淫恣益甚，……濁亂朝政，無所不至。及英宗立，羣倖伏誅，而後勢焰頓息焉。」<sup>94</sup>史文先褒後貶，貶多於褒。按〈后妃傳〉史源約略有四：一是仁宗、英宗、順帝三朝敕修的《后妃傳》，二是《累朝實錄》、順帝朝的時政記科記事錄與《經世大典·賦典·宗親歲賜》篇，三是《國朝文類》所錄冊文，四是互見於《元史》相關傳記的材料。<sup>95</sup>大抵係以官方編修文書為主。武宗繼立以後，元朝帝統歸於順宗一脈，後來諸帝，多為答己子孫，「淫恣益甚」云云，語涉曖昧。如此惡評，似不合理，頗疑出自明初《元史》纂修者的手筆。

《元史》本傳所謂「教宮中侍女皆執治女功，親操井臼」，說明答己之崇儉與對內宮之節制。我們可以結合另一條材料加以申論。元人賈汝舟撰〈邸彥通重修先塋碑〉（略稱〈先塋碑〉）<sup>96</sup>有云：「大德壬寅〔六年，1302〕，皇太后時為太子妃，召賜銀鈔、衣服、糧食，分付宮女數人，令彥通以《古今〔今字衍〕列女傳》訓誨。」邸彥通（1237-?），《元史》無傳，生平概見〈先塋碑〉。據碑載，彥通年十三與蕭颯（1241-1318）同拜寓軒張秀實為師，<sup>97</sup>「天性得繪塑三昧」，後奉旨從阿尼哥（1245-1306）學塑梵像。<sup>98</sup>彥通「幼歲頗攻學業」，「字畫謹楷，誦之，音吐弘暢」，或以此故，得被

<sup>93</sup> 董斯張等：《吳興藝文補》，《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五三，虞集〈題管夫人墨竹〉，頁四三下。王頌點校的《虞集全集》似未參考此書（〈前言〉，頁1），該詩未見收錄。

<sup>94</sup> 《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二〉，頁2902。

<sup>95</sup> 王慎榮、葉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120-25，152-54。

<sup>96</sup> 此碑釋錄，應以《求是齋碑跋》為先，惜所錄碑文多殘。其後，《重修曲陽縣志·金石錄下》「求得舊搨，校之碑末」，頗有增訂，可以參考。見丁紹基：《求是齋碑跋》，《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影印民國五年（1916）烏程張氏《適園叢書》本（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年），卷四〈邸彥通重修先塋碑〉，頁二二下至二四下；董濤：《曲陽金石錄》，《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影印清光緒三十年（1904）刊《重修曲陽縣志》卷十一至十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卷十三〈重修邸氏先塋碑〉，頁六四下至七一下。

<sup>97</sup> 蕭氏為元代著名學者，師承所自，《元史》本傳、墓誌銘及其文集俱未載。見《元史》，卷一八九〈儒學傳一〉，頁4325-26；蘇天爵（著）、陳高華、孟繁清（點校）：《滋溪文稿》（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八〈元故集賢學士……蕭貞敏公墓誌銘〉，頁114-21；蕭颯：《勤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sup>98</sup> 阿尼哥的生年有疑。據《元史》本傳，「中統元年〔1260〕，……年十七」（頁4545），可推知〔下轉頁104〕

答己召，而命以《古列女傳》（一名《列女傳》）訓誨宮女。按此事發生於答己在成宗朝寡居之際，頗具意義，概有三端：

其一可反映答己節制宮女的苦心，不僅如《元史》要求「執治女功」之行為，更從思想上教而訓之。袁桷（1266–1327）在答己的追謚冊文之中，曾以「內教洽乎宮庭」為贊，<sup>99</sup>雖不免溢美之嫌，但多少反映事實。

其二可再度印證答己對中原文士的親禮，早在寡居大都之時已然。

其三可表示答己對漢文化的態度。她請執以教誨宮人者，係以中原傳統婦女規範的《古列女傳》為本，相信她不致對該書一無所知。《古列女傳》相傳為西漢劉向所撰，「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可法則，及孽嬖亂亡者」，序次成書，共八篇，<sup>100</sup>今見「母儀」、「賢明」、「仁智」、「貞順」、「節義」、「辨通」與「孽嬖」七卷，<sup>101</sup>大抵體現的是儒家的婦女觀。大德十一年，武宗入繼大統，被立為太子的愛黎育拔力八達，「遣使四方，旁求經籍」，下命刊行《大學衍義》、《圖象孝經》與《列女傳》，賜予臣下。<sup>102</sup>此時，上距答己命邸彥通以《古列女傳》教育宮女，已歷五年。愛黎育拔力八達刊行《列女傳》的目的，頗堪深思。

《列女傳》之外，答己對《資治通鑑》應不陌生。虞集為高艫（1238–1290）所撰神道碑，記其繼室葛氏曾受答己召，「講《資治通鑑》，論古今政治得失」。<sup>103</sup>高艫，字彥解，女真人。事世祖於潛邸，以慎密受知。中統三年（1262）選掌東宮文史兼領長禁衛，真金以其鬚黃，賜名「失刺」（蒙語「黃色」）。累官河南等路宣慰使。泰定三年（1326）追謚貞肅。《元史》卷一六九有傳，未及神道碑之詳，葛氏事蹟即未見載。據神道碑載，高艫卒時，葛氏尚當盛年，闊闊真念艫事真金之功，驛召葛氏母子至大都。葛氏「習於詩禮，通古今，常以經義為女師宮中」。此時寡居皇宮的答己或即識其人，故當延祐三年有司以葛氏貞節進奏時，遂有召講《資治通鑑》之事。<sup>104</sup>葛氏如何進講《通鑑》，史文未詳。其丈夫既「習國語及西域語」，她或受影響，而得以蒙古文解說。無論如何，答己對「古今政治得失」的留意，並非一時興起。皇慶二年

〔上接頁103〕

生於1244年。若據程鉅夫所撰神道碑（《程雪樓文集》卷七，〈涼國敏慧公神道碑〉，頁八上至十一下），阿尼哥卒於大德十年（1306），「壽六十有二」（年壽與卒年，《元史》均失載），回推生年為1245年。此處從後說。

<sup>99</sup> 袁桷：《清容居士集》，《四部叢刊正編》重印上海涵芬樓景印元刊本，卷三五〈昭憲〔獻〕元聖皇后謚冊文〉，頁一上。

<sup>100</sup>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三六〈楚元王傳附劉向傳〉，頁1957–58。

<sup>101</sup> 張濤：《列女傳譯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0年）。

<sup>102</sup>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頁536。

<sup>103</sup> 《虞集全集》，〈高莊僖〔魯〕公〔艫〕神道碑〔銘〕，應制〉，頁1052。

<sup>104</sup> 陳高華認為葛氏在元朝宮廷的職務，應類似於金代設置的宮教。見陳高華：〈元代女性的文化生活〉，頁69。



(1313)，答己曾下命做倣古制製造可以坐乘的「安車」，讓當時未克隨從上都的大臣「驛赴行在」，可證她嫻於歷史掌故。<sup>105</sup>另外，錢天祐(1276-?)於延祐二年(1315)撰作《孝經經傳直解》，進獻尚在潛邸的英宗碩德八剌(1303-1323)，承其令命翰林官譯以畏兀字，奏陳仁宗與答己太后，「已徹睿覽」。<sup>106</sup>是答己亦曾觀覽該書。

## 結語

本文討論答己與漢文化的關係，略分四節：首先自答己的家庭背景切入，推測她與漢文化接觸的可能。答己可能出身日趨衰敗的弘吉剌部支系，是否得以接觸漢地文化，無從索考。出適答刺麻八剌之後，身處於漢學風氣頗盛的環境，既長侍熱衷漢學的家翁，又有接受漢式教育的子女，濡染之下，對於漢文化應非一無所知。其次考辨王振鵬的〈歷代聖母賢妃圖〉。此畫相傳乃振鵬為答己所繪，答己特於宴請眾臣席間，出示群臣品題留名，顯示她既雅好中原藝術，又懂得士大夫題識的文化。雖然畫跋可能出自後人偽造，但對答己與漢地繪畫的關係，具有啟示的作用。再次將重點置於答己與元朝著名文士趙孟頫的關係。答己對孟頫在書法與文學上的傑出才能，十分欣賞，頗為借重，對趙氏妻管道昇亦甚禮遇。這與仁宗對藝文的喜好，相當一致。最後探討答己在美術之外，對漢地書籍的認知。現可徵知者，答己對《列女傳》、《資治通鑑》與《孝經經傳直解》三部書均有接觸。

本文顯示：答己所受漢文化的影響，可能為論者低估以至於忽略。答己的漢學造詣雖不可詳，但具有一定的漢文化素養，應無疑義。元朝皇室女性成員，尤其是出身蒙古族的婦女，她們與漢文化的關係，值得深論。此外，答己在元中期權力爭奪中所起的作用，容可商榷，但歸諸為源於文化差異的意識型態之爭，似難成立。對於答己其人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她在武仁英三朝政治地位變化的考察，筆者期諸異日的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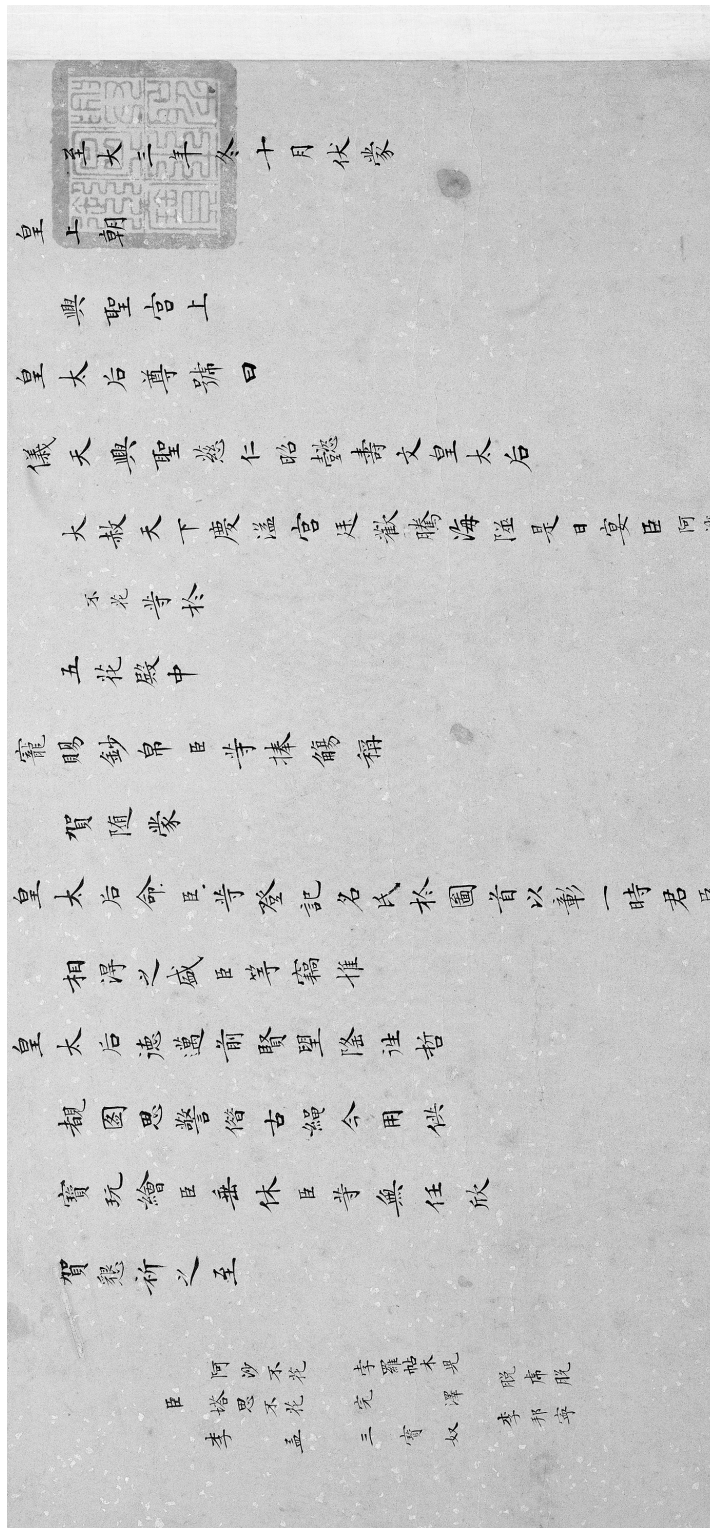
2010年4月16日初稿，9月7日二稿，10月16日三稿

<sup>105</sup> 程鉅夫：《程雪樓文集》，卷八〈太原宋氏先德之碑〉，頁八下。

<sup>106</sup> 解縉等(編)、中華書局(輯)：《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線裝本)，卷一〇八八八〈六姥·古·敘古〉，引錢天祐〈敘古頌表〉，頁一下。



圖一：元順宗后像（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圖二：元王振鵬畫手卷引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品）

# A Study on Yuan Empress Dowager Dagi's Attitude towards Han Chinese Culture

(A Summary)

Hsu Cheng-hu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golian and Ha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Yuan dynasty has been studied by many scholars. However, few have examined the cultural proclivities of the Mongolian royal women at the Yuan court. Dagi (?–1322), mother of the Yuan emperor Wuzong (r. 1307–1311) and Renzong (r. 1311–1320),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id-Yuan politics. In the past, scholars had considered that Dagi, embedded with strong nomadic consciousness, was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Mongolian conservative nobility and promoter of their interests. This evaluation needs deliberation. The present paper re-examines Dagi's attitude towards Han Chinese culture; the study shows that Dagi had a few accomplishments in Chinese culture, and she was definitely not an outsider. She was friendly to the Han literati, was fond of Chinese paintings, and showed some familiarity with Chinese ancient books. Dagi's political role in the mid-Yuan period needs further research, but it is certain we cannot partially generalize on the basis of Mongolian-Han Chines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關鍵詞：**元朝 太后 漢文化 答己 王振鵬 趙孟頫

**Keywords:** Yuan dynasty, empress dowager, Han Chinese culture, Dagi, Wang Zhenpeng, Zhao Mengfu